

## 对一个老京剧艺人的访谈

谭金麟口述 徐剑雄整理

徐：谭先生，您好，很高兴能倾听您对自己几十年从艺生活的回忆。

谭：不敢称先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京剧艺人。

徐：您是京剧世家啊，我在研究上海京剧过程中发现一些有关您和您先生以及您父亲的资料呢！

谭：可以说是京剧世家吧。我1923年7月8日出生于上海。父亲谭永奎，工武丑、三花脸，长期与盖叫天合作，拿手戏为《三岔口》。我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姐姐没吃唱戏这碗饭，妹妹进了梨园，工青衣花旦，叫谭芝麟。父亲跟盖叫天在舞台上合作20多年，姑父陈桂香也是唱京剧的，曾经到上海来演唱过，因为没有拜客，在上海没唱红就回北方去了。

徐：现在很少人知道当年的京剧艺人拜客是怎么回事，您讲讲吧？

谭：在旧上海，京剧界有拜客风气，是不好的风气，但是也不是艺人们自己想去拜客啊，是没办法。戏院都被流氓大亨所控制。票房和小报也对艺人的演出有影响。唱戏的要想成为红角，初来上海，必须与黑社会大亨们、剧场老板合作，听从他们指挥，否则没办法在上海滩立足，轻则被迫离开上海，重则丧命。

徐：常春恒就是因为不愿在天蟾唱戏得罪老板而遭暗算，周信芳、盖叫天因为不愿被老板控制而远走他乡，被迫长期在上海以外演唱，他们都是上海有名的艺人，也身不由己，更不用说那些中下层艺人了，他们更惨吧？

谭：是啊，就拿我父亲来说吧。他在共舞台演唱时，也得罪了黄金荣，被迫离开上海，到外地卖艺谋生。事情的起因大概是这样的：当时戏院有不成文的规定，每年6、12两月是戏院生意冷清的时节，老板为了赚钱，要求戏班各位演员必须给戏院老板“帮忙”，演唱后只给一半戏份，实际就是变相克扣包银。这就苦了底层的小角色了，盖叫天包银每月有3000元，我父亲是较有名的武伶，包银120元，其他武行角色有的只有36元、24元、20元、18元不等，这样低微的收入再扣去一半，他们难以养家糊口的，生活艰难就可想而知了。我父亲和李德山等武行艺人于是成立武行会，团结起来抵制，拒绝给老板“帮忙”。其他收入低微的角色也继起响应，拒绝给老板帮忙，这下可好，艺人们团结起来和老板对抗了。各舞台老板很恼怒，眼见利益受损，决定要教训一下我父亲和李德山。当时我父亲他们正在法租界大马路共舞台演出连台本戏《西游记》，很卖座。一天，演出结束后，后台老板把我父亲和李德山叫去，严厉地责问武行会的事，说老板黄金荣已经发话，让他们离开共舞台，不准在上海搭班唱戏。还说这是黄老板发慈悲，否则你二人就别想活了。父亲在上海无法立足了，只好暂时和我们离别，避祸他乡，去跑码头，到外地搭班，卖艺谋生。

徐：您父亲在外地卖艺谋生，您和母亲留在上海，生活一定很艰难吧？你们怎么生活呢？

谭：很艰难，可以说祸不单行，家恨国仇一起出现。我父亲离开上海，先后到过杭州、宁波、金华、以及江西等地，颠沛流离，卖艺极端辛苦，社会动荡不安，穷人哪有心思看戏，有时十来天没生意，而有时找到生意了，连续十几天不停顿地从这个地方奔到那个地方，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好。而我母亲带着我们姐妹三个在家担惊受怕，积郁成疾，我们托人把情况告诉父亲，父亲得信后星夜兼程赶回上海，千方百计从亲朋好友那里筹借一点钱为我母亲治病。父亲不能再到上海以外跑码头了，而家里还得依靠他挣钱买米买油买菜啊，父亲硬着头皮，好说歹说找人帮忙进了更新舞台，辛辛苦苦只能每月挣几十元

钱，都用在延医买药上。可母亲的病情并没好转，不久，母亲在无限的痛苦和牵挂中离开了人世，那年我才6岁。

我家当年住在八仙桥，母亲去世后，更新舞台的一位好心的老武行艺人跟父亲说，由他老婆帮忙照顾我们姐妹，让父亲安心上舞台。他们夫妇很善良，和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日本鬼子侵略上海时，闸北遭受日军狂轰乱炸，我家也被烧毁了，当时真是吓人，我很小，耳闻目睹的到处是浓烟和火光，是奔逃的身影，是嚎啕大哭的声音，是叫骂声，是爆炸声。

徐：连续遭遇这样大的变故对你们真是太残酷了！

谭：谁也没料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家破人亡，就这样，家没了，母亲也走了，对我们姐妹而言太可怜了。但父亲很坚强，遭受连续沉重打击的他并没有消沉，武伶出身的他还是带着我们挺过来了。母亲去世后他一直没再结婚，把所有的爱给了我们姐妹三人，尽心尽力抚养我们长大成人，教会我们谋生的技艺。可以说他自己一生辛劳，没有享受什么，1966年，父亲在南京去世。

徐：是啊，那个时代，很多人和您父亲一样付出了很多，但是很少能享受。您后来是怎么走上京剧艺术表演的道路的呢？

谭：从小耳濡目染，受到父亲的影响吧。小时看到舞台上的花花绿绿的布景，生、旦、净、丑的精彩表演，听到他们动听的唱念，这些使我对舞台表演戏充满向往。同时也是那个年代为生活所迫，学戏可以找到一个谋生的饭碗。我8岁就开始学戏，白天经常到湖社练戏，晚上就在弄堂里继续练，还跟着父亲到更新舞台练。父亲教我武生戏，我也跟姑父陈桂香学老生戏（姑父和姜妙香是师兄弟），所以在台上我武生老生都能演。学会几出戏后，为了减轻父亲负担，我开始应堂会戏。

徐：堂会戏当年在北京是很盛行的，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国都于南京，堂会在北京一落千丈了。那当年上海的堂会很盛行吗？

谭：主要是有钱人家举办。一般小康之家有喜庆事，叫上几个票友唱唱就完了。而那些流氓大亨、商人、大官们就要请名角了，杜月笙家祠堂落成庆典就举办过堂会，那才轰动呢。

徐：您什么时候正式登台的呢？

谭：我16岁正式登上舞台表演。在堂会戏中，我演戏中的小孩子，如《三娘教子》、《桑园寄子》、《逍遥津》中的小孩。当时上海人看京剧，一是喜欢旦角，二是喜欢童伶。我14岁开始在堂会戏中演主角了，只能挣一到两元钱。15岁那年演《石秀探庄》，饰石秀，能挣5到20元钱了。堂会，锻炼了我，开了眼界，提高了技艺，学会了很多戏，也有了自己的几出拿手戏，其中最擅长的是《石秀探庄》。1939年，我16岁，进入天蟾舞台后面的长乐茶楼演唱，用艺名谭金霖。开始只是清唱，后来就粉墨登场，包银每月120元。

徐：据我的研究，30、40年代，上海有像天蟾这样的大戏院，设备新，座位舒适，专演京剧，演唱者是南北名伶，票价高，观众是有钱的中上层人士。除大戏院外，还有很多为中下层市民喜爱的小型剧场。长乐是当时著名的小型剧场之一，小型剧场在当时上海相当热闹，常有很优秀的艺人在这里面脱颖而出。在小型剧场有两类艺人：一为潦倒艺坛郁郁不得志的艺人，第二类则如您这样天赋聪明，刚刚踏上鬻艺之途的新人。

谭：是这样的情况，我也是在长乐唱了一段时间，小有名气的。当时长乐的武生是我，老生是仇乐弟，就是孟小冬的妹妹；旦角是周梅艳，人们都称我们是小型剧场隽才，个中翘楚。后来我们三人都跻身大戏院了。我在长乐茶楼演了几个月，得到观众的好评。当时上海观众喜欢武戏，尤其是真刀真枪的表演，我演的《武松杀嫂》在长乐很卖座，我扮演武松，做工精到，开打干净利索。我父亲长期和盖叫天合作，所以我的武戏是宗盖老路子的，看起来有盖叫天的风格，很多小报写了捧我的文章，更有喜欢我的戏的戏迷，称我是“女盖叫天”。这实在不敢当，只是观众喜欢我的戏，我的技艺怎好跟盖老比呢！

徐：您太谦虚了，作为女武生，你确实有自己的特色。我这里有当年剧评家写的有关您的剧评，我读给您老听听，一份是《上海生活》（第3年第2期，1939年2月17日）刊登了爱萍室主的一篇文章《谭金霖艺术不凡》，他这样说：“（谭金霖为）不可多得之佳材，无论唱念、神情、武工、身段，莫不边式美观，规矩不火。据接近金霖的友人语余，《翠屏山》为其代表作之一，宜乎其演出如绘如画也，余观其酒楼借刀一场酒醉时之愤怒，活描出拼命三郎之神情，工架老练，堪称脂粉队中之一绝材，耍刀亮相

之身手矫健，使余疑其非女子身！……金霖以十余岁之女孩，有此身手，殊属难能可贵，而今埋没于茶楼歌场，知音寥寥，岂不可叹也夫？”还有一篇是《申报》上的（1939年12月30日）署名辛人的《周梅艳、谭金霖印象记》，这篇文章写道：“谭金霖，芳龄还只有十九岁（应为16岁——整理者注），是名武伶谭永奎的掌珠，演武生戏，长靠短打都很出色，且是学成不久便在那里出演的。在武艺方面，如《杀山》的刀，《探庄》的担，《刺巴杰》的剑，《蜈蚣岭》的拂，《白水滩》的摔发等，全都身手敏捷，十分工稳，将来更加磨练工夫，定不难攀上最高的峰巅。她在下场以后，容色狭长而雪白，嘴唇是那么微厚的，而眉清目秀，秀发如云，和那富有健美的修短适中的体干，也都充分表现着时代姑娘的美态。但就这样看来，谁都只认为是一个女学生，不信她跳到舞台上，竟又是位武艺高强，惯状英雄本色的女艺人。”

谭：哦，那时的事情很多已经忘记了，谢谢你。我继续谈谈我后来的从艺生活吧。

在长乐茶楼唱满期后，我已小有名气。1940年受邀去宁波江北岸共舞台，那年17岁，包银每月450元。演唱半年，卖座还挺好，只是后来天气开始变得炎热起来，日本军队又经常袭击，时局动荡，人心不稳，戏院演唱受到影响，我也很担心，感到此地不可久留，决定离开宁波回上海，但是上海已经成了孤岛。我不得已辗转去了苏州，在苏州开明大戏院演唱，白天折子戏，晚上演连台本戏，主要剧目有：《西游记》、《火烧红莲寺》、《封神榜》，我演过唐僧、小孩等角色，当时和我同台的还有一个老生徐鸿培。这一次在苏州一演就是两年，在这两年里，几乎日夜有戏，和很多京剧艺人同台演唱，学到了不少技艺，也锻炼、提高了自己，作为一个武行演员，我的技艺日益走向成熟，能独挡一面了。

徐：旧时，很多成名的角都自己组班，你也单独组班吗？

谭：也试过，在南京。1942年，我离开苏州到南京，进入明星大戏院，包银1900元，当时李少春刚离开明星大戏院，由我顶上去，文武老生都演，演过的戏有《捉放曹》、《两将军》、《空城计》、全本《四郎探母》、《红鬃烈马》。起初，很多老前辈和老观众都怀疑我，一个19岁的姑娘能否演好这些戏中的角色，这写角色对唱工、做工要求都很高，没有两下子是不行的。看了几场戏后，我的唱念做打都显示出老到的功底，娴熟的演技终于使他们都信服了，因而在明星大戏院的演唱还是很叫座的。一个月后，我被邀去宿县演唱，此地民风强悍，一些当地的地头蛇要我去陪酒，威胁说如不去就闹我的戏场。旧时代艺人社会地位很低，常被权贵、黑恶势力欺压，我可咽不下这口恶，坚决不理睬。

徐：看来您和您父亲一样，正直勇敢，不畏强暴，您拒绝了地头蛇要求，对于一个女性来说真不容易啊！

谭：实际上我也有些害怕，但是你怕，他们更肆无忌惮欺侮你，我想以后立足就得天不怕地不怕，我演武松，就要有武松的勇敢，豁出去了。地头蛇恼羞成怒，伺机报复。一天傍晚，当我正在戏院演唱《摩天岭》中薛仁贵探山时，一群人忽然冲进戏院来，向台上扔东西，喝倒彩，大闹一通，搅乱了整个戏院。在宿县无法演唱了，我就到无锡、常州等地演唱，这些地方都在敌伪统治下，社会秩序混乱，艺人无立足之地，时刻都遭受伪军、流氓无赖之徒的骚扰、讹诈、欺侮。无奈之下，在外漂泊了3年，我又回到了上海。

徐：回上海后，你还继续登台唱戏吗？

谭：继续唱了两年。我回上海已经22岁了，凭我的技艺不用再进小型剧场了，我的妹妹谭芝麟一直在中国大戏院演唱，我回上海后也进了中国大戏院。中国大戏院是黄金荣当老板的，我进戏院时，黄金荣问我：“是不是谭老五的闺女呀？”意思是要我求他照顾，但我脾气很倔强，不理睬，心想一个上海滩的闻人犯不着与一个小角色为难吧。当时在中国大戏院登台的还有老生林树森、小三麻子，旦角张淑娴、曹慧麟、芙蓉草，武生有王小舫，我演的是武花旦。

徐：听说您的丈夫也是海上名票，是京剧使你们走到一起的吧？

谭：对，是这样。我们是在上海大戏院出演期间结识的。他叫郭脩脩，就是郭正懋（脩脩是艺名），他当时是上海著名麒派老生票友。那时当票友有两个条件：一是家境殷实，有票戏资本，二是有文化，懂戏，能研究戏。郭正懋祖籍浙江宁海，出生于殷实的商人家庭，郭的父亲和叔叔在上海开有五金工厂。郭正懋先在洋人开设的哈同公学读书，后就读于正风文学院，毕业后进洋行学习金融，后来脱离洋行自己开办钱庄。郭正懋小时就嗜好京剧，十三四岁时学戏，成年后结识了许多著名京剧演员，郭是30年

代上海票界中享有盛名的做派老生。他会戏很多，文学修养极深，爱好广泛，你看，这墙上挂的是他以及他的好友们的字画。

徐：哦！确实不同凡俗。据我所知，一般来说，票友剧学修养比京剧艺人深厚，因而京剧艺人都愿意请教票友。您也得到郭先生不少指教吧？

谭：对，我们就是在互相交流京剧表演中加深了解的。不光是我向他请教，其他很多京剧名角曾问艺于他，如马连良曾与他探讨京剧服装改良问题，周信芳、林树森等常与他切磋技艺。周信芳很赞赏他在《雪拥蓝关》中的唱做工夫。我结识郭正懋，也算遇到了知音，对我技艺的改进有很大帮助。我们1947年结婚，婚后，暂时停止了在舞台的演唱生涯，解放后，我重新登上舞台。

【口述者简介】谭金麟，京剧表演艺术家。

【整理者简介】徐剑雄，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200234

（责任编辑：高俊）

---

（上接第10页）认识雷士德学校的老师才知道这个学校的，自己来看过之后，也觉得很满意。后来我和学校的英国校长也很要好，甚至和他的女儿也很熟悉。有一次我们早上到虹桥去骑马，碰到一个英国小姐，便和她攀谈，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她叫Newson。我差点从马上摔下来，原来她就是我们威严的英国校长的女儿！校长非常严肃，学生和他谈话，都必须首先大声回答：“Yes Sir！”态度相当恭敬。

我因为自己喜欢语言，觉得语言还是很有用的。在美国，我退休后到中学做代课，样样都行，无论是科学还是别的方面。我懂7国语言，有一年想到俄罗斯去旅游，我就到大学里学了两年俄语，然后再去莫斯科，我觉得这样才能有所交流。有人问我，7国语言会不会搞错，我说不会，因为我喜欢语言。当时在雷士德学校读了两年日语，原来我不肯学，后来我发觉日语和中文很像，完全参照中文。学了以后还真派上用场了，我们家的工厂里缺煤，我父亲就说你当我的翻译，我们到日本军部去和他们谈判。后来日本人果真给了我们几车煤，所以掌握好语言还是能够派上用场的。还记得珍珠港战役后，雷士德学校被日本人接收，日本校长要我们欢呼三次“天皇陛下万岁”。大家当然不愿意，只好勉强敷衍了事。后来几个讲广东话的同学想出一条妙计，日语“万岁”与粤语“笨仔”发音酷似，可以混用。于是以后每次欢呼“笨仔”，我们自然十分热烈，日本校长与学生各行其事，皆大欢喜。

【口述者简介】邓志雄，男，77岁，出生于上海，在雷士德学校完成了初中、高中课程，进入圣约翰大学学习两年后，于1947年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化学工程，定居美国，长期从事纺织工业事业。

【整理者简介】房芸芳，馆员，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200050

（责任编辑：段炼）